

· 学界观察 ·

〔读书评书〕

## “佛法无边”:张恨水小说的文化建构与解析〔\*〕

——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中心

○ 汤哲声, 董 胜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张恨水的小说专注于“情”如何“言”, 凭借世俗化的佛学思想来表现传奇的故事。文章以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中心, 阐述了其小说中的“机缘观”“苦空观”“色空观”等思想, 从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两个方面论证了张恨水佛学思想形成的原因; 并通过与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品《玉梨魂》的比较, 揭示出张恨水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从命运层面到宗教层面的突破, 分析了张恨水小说从言情到悲情的文化建构, 同时, 说明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具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张恨水; 佛学; 文化建构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4.018

按照老舍的评价, 张恨水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妇孺皆知的通俗文学大家”。<sup>〔1〕</sup> 值得思考的是, 为什么张恨水的小说在中国民间就受到如此大的欢迎呢? 要论言情故事,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不乏优秀作家作品, 例如鸳鸯蝴蝶派; 要论抗战小说, 也有很多作家创作, 例如“战国策派”。张恨水小说产生如此大影响的原因究竟何在? 关键不在于故事的设计, 而在于故事的表现形态。按照叙事学的理论, 将小说文本分成“故事”和“话语”。“故事”只是情节, 如何说故事的“话语”才是文本传播的有效途径。

---

作者简介: 汤哲声, 文学博士, 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州大学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 董胜, 苏州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13&·ZD120) 及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AHSKYG2017D160)阶段性成果。

## 一、“只在捻花一笑中”:佛学思想对张恨水小说叙事话语的建构

张恨水在《小说考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子尝谓中国小说家之祖,与道家混。而小说之真正得到民间,又为佛家之力。盖佛教流入中国,一方面以高深哲学,出之以典,则之文章,倾动士大夫。一方面更以通俗文字,为天堂地狱,因果报应之说,以诱匹夫匹妇。唐代以上,乏见民间故事之文。佛教通俗文字既出,自为民间所欣赏。而此项文字,冀便于不识字之善男信女之口诵,乃由佛经偈语蜕化,而变为韵语。”<sup>[2]</sup>张恨水认为小说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形成通俗化,是得力于“佛家之力”。反过来说,佛学思想凭借着小说在民间得以宣扬。通俗小说文本的建构与中国受众的需求相辅相成,而其中的交接点则是佛家文化。

以世俗化的佛学思想表现传奇的故事正是张恨水小说得以流行的奥秘。《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不仅仅是因为张恨水要“赶上时代”<sup>[3]</sup>,写了军阀对平民的压迫,更深层次的阅读动力是小说揭示的“因缘”。张恨水在解释为何是“因缘”而非“姻缘”时曾作如此解释:“……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sup>[4]</sup>“因缘说”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又称“十二因缘说”,所谓“十二因缘”,即人从生到死之间起连接作用的十二个环节: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些环节彼此成为条件或因果联系,是涉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总的因果循环链条。张恨水以此来构划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将很多离奇巧合的情节元素化成了“机缘”。离奇巧合是“外缘”,是一些偶然人物与事件的碰撞,但是为什么又是这样一些的人物与事件的碰撞呢?那是冥冥之中因缘决定的,这是“内缘”。“外缘”由“内缘”决定,“内缘”由“外缘”呈现,这就是因果循环的链条。樊家树为什么看中沈凤喜呢?天桥偶遇只是“外缘”,命中注定才是“内缘”。沈凤喜和何丽娜长相惊人的相似,作者其实在暗示读者,沈凤喜和何丽娜是一人两面,她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出身和生活状态,沈凤喜却只是何丽娜的一个分身。对此,小说中有暗示,稍一摆脱了贫困的沈凤喜即表现出何丽娜同样的毛病:爱慕虚荣。秉性一致,本是一人。沈凤喜被刘德柱鞭挞致疯,是何丽娜的人生劫难,是她接受惩罚的人生渡难。既然沈凤喜和何丽娜是一人两面,樊家树天桥下偶遇沈凤喜就不是偶遇,而是必然,因为樊家树与何丽娜本身就有婚约在前,后来的樊家树在西山再遇何丽娜也不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他们的婚姻早已命中注定。《啼笑因缘》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人生劫难、人生渡难的因果轮回。对此,小说结尾有着明示:当沈凤喜正在世间演绎着她的贪、嗔、痴的时候,何丽娜在西山学佛。沈凤喜被鞭挞致疯,何丽娜学佛有成,此时,引渡人关秀姑将樊家树带到西山,何樊二人再次相见。关秀姑临别之时送来一束菊花,何丽娜抽出一支给樊家树:

家树呆呆的站着,左手拿着那支菊花,右手用大拇指食指,只管拈那花千儿。半晌,微微一笑。

正是:毕竟人间色相空,伯劳燕子各西东。可怜无限难言隐,只在捻花一笑中。<sup>[5]</sup>

“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一切都在捻花的一笑中。

张恨水自己说,他的作品分为“写心之作”与“射利之作”两种。具体哪些是写心哪些是谋利,我们难以明说,至少张恨水的几部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可以算得上真情实意,算得上写心之作。也正是在这几部小说里,佛教思想体现得特别明显。

《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张恨水原名张心远)是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甚至对其痴迷的人物,他时常与人谈经论佛,并试图在佛学中寻找解除烦恼的方法。而这位自视清高、孤芳自赏的主人公在一个如此混沌不堪的社会,注定是要被人潮所湮没的,在连续的打击下,他最终变得消极厌世,“色即是空”的感悟慢慢笼罩住他全身,对现实的彻底失望让他不得不沉浸于佛教所提供的无声色的世界中。杨杏园毕生都在为破“我执”而努力,而当他手捧《大乘起信论》圆寂的那一刻,一切都回归到了原点,死亡,是最好的解脱方式,而对于杨杏园来说,能在“一花一世界”的佛境中超脱,也算一大圆满。此外,主人公凄然死去时,作者的悲悯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对芸芸众生的关切浸透着佛家的“大爱”。杨杏园是张恨水倾注了对人生形态的思考和佛教文化“悲苦观”“色空观”的理解而创作的人物,他的悲剧命运源于张恨水对生命的深切领悟,事实上,“苦”“空”其实也是张恨水早期小说的主题基调,他利用“苦空”的故事架构描述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因此作品常弥漫着浓郁的感情氛围。此外,以杨杏园为例,张恨水的创作也致力于以佛教色彩浓厚的笔下人物为“镜像”来思考当时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姿态,即在乱世中,人应该如何生存,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既不能同流合污而又该如何拯救自我?这些都是作者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基于佛教文化之上的深刻思考。

《金粉世家》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在金太太和冷清秋这两个人物身上。作为国务总理夫人,金太太在经历了丈夫亡故、儿女各自分散的变故之后,“空”,是她对自己这么多年人生的最终总结,何其悲凉与落寞!最终她独自一人前往西山,与佛相伴,以此摆脱尘世的苦恼与忧愁。“精神上很是痛快,争名夺利,酒色财气,那些事一齐不到我的心上。”<sup>[6]</sup>昔日的富贵转眼便烟消云散,回头来看,一切早已沧海桑田,而对于人生来说,其实又有什么是永恒的呢?金太太当了近乎一世的阔太太,最终却因这样的变故落得在寺庙伴佛度余生的结局。她的人生轨迹与张恨水本人的经历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说,张恨水是将自己的人生阅历融入了作品中,从而赋予了作品以更强的生命力。一切艺术皆源自生活,张恨水以他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色空观”的解读塑造了金太太这一人物形象,体现了人生浓重的悲凉。冷清秋是《金粉世家》中另一与佛教文化结缘的女性形象,她坚持追求

佛教所宣扬的至真至善的爱情,她的爱情道路是坎坷而不幸的,平民女儿与总理儿子的结合或许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悲剧的结局,从恋爱、结婚、婚变直至最后的出走,冷清秋始终坚持着爱情至上的原则。婚姻决裂后,她独上小楼礼佛,青灯枯卷相伴,心怀佛缘抄写经书,毅然走上了向自己苦难的人生和变质的爱情抗争的道路,从佛学中,她重新获得了生命,获得了抵抗自身悲剧命运的动力,获得了自我拯救的可能,而这种超脱也使她最终获得了与佛、上帝同在的幸福。由此可见,作者在冷清秋这一人物形象上不仅倾注了佛教文化的超脱和自我拯救,她勇敢追求爱情,到后来主动放弃无爱的婚姻直至最终大火后的涅槃重生这一系列行为,也是佛教独立人格与平等之精神的最直接体现。

张恨水小说的结局基本上是悲剧告终,均指向“空”,但是细读张恨水的一些代表作品,就会发现似乎并不“苦”。《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和沈凤喜的恋情是悲剧,然而小说最后樊家树的“捻花一笑中”却留下了他与何丽娜的身影;《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终究没有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梨云病逝,杨亦圆寂,留下李冬青孤独于世,然冥冥中似乎这是最圆满的安排,若杨和梨云在一起,落魄文人和妓女的生活不会幸福;若杨和患隐疾的冬青结合,生活也是不如意,唯有各自散去。于佛教中得以慰藉,各自获得解脱,这或许是张恨水的根本考量;《金粉世家》塑造了家庭悲剧的模板,门第出身不同,人生价值观不同的金燕西和冷清秋因为缘分恋爱,结婚,最后分离,揭露出一幕幕伦理道德危机下的家庭悲剧。然而,冷清秋最后小楼礼佛读书,在大火中不知所终,可能正是人生的涅槃轮回。“悲”“空”的人生结局为小说笼上悲剧色彩的同时,也不禁引人深思,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存在和这个世界?这些疑问,对张恨水来说,或许都能在佛学思想中找到答案,哪里是“悲”,哪里是“苦”,那不过是人生的又一境界。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 二、“但愿一杖一盂,作一游方和尚”:作家内在体验在小说人物身上的文化投射

阿堵问赵州和尚: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在哪里?赵州和尚以一个袁头示之。饭桶问赵州和尚:人生是什么?赵州云:今天吃饭也未?不了生问赵州和尚:什么是空不异色?赵州唱道情云:只落得娘儿爱俏,把孝来穿!不了生问赵州和尚:什么是色不异空?赵州云:令爱若干岁矣?不了生曰:十六矣。赵州云:买本性史给她看!二我问赵州和尚:何谓无人相?赵州云:何不多多和人换兰谱?二我问赵州和尚:何谓无我相?赵州云:你愿拉车吗?二我问赵州和尚:一藐一菩提,译作无上正觉吗?赵州和尚云:我去问谁?老先生竖一指云:此似我佛拈花否?赵州和尚云:门外什么响?音乐队过去。做么生?迎新生。赵州哈哈大笑云:尔是解人,尔是解人!

草草问赵州和尚:何谓色即是空?赵州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草草问赵州和尚:何谓空即是色?赵州云: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sup>[7]</sup>

这两段充满着禅机的文字发表于1927年6月20日北京《世界日报》的《明珠》栏目里。讲的是人生在世就是一个旧生迎新生的过程,讲的是色就是空,空即是色。张恨水那年30岁。从1924年到1932年,正是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创作的繁荣期,这些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这两段文字可以对他此时创作的文化思考作一个注脚。

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序里写到:

嗟夫!人生事之不可捉摸,大抵如是也。忆吾十六七岁时,读名人书,深慕徐霞客之为人,誓游名山大川。至二十五六岁时,酷好词章,便又欲读书种菜,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至三十岁以来,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但愿一杖一盂,作一游方和尚而已。顾有时儿女情重,辄又忘之。今吾儿死,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sup>[8]</sup>

说得很明白,30岁时的张恨水满脑子的佛学禅语,甚至还有做个“游方和尚”的念头。

张恨水出生于江西,青年时代生活在家乡安徽潜山。安徽潜山属于皖江文化圈。在皖江文化中,佛教文化是其重要的哲学基础。家乡的佛学文化氛围只能说是张恨水的文化基因。它被激发起来完全是因为他的生活变故和对生活的参悟所致。年少时期的张恨水充满着儒家入世的观念。正如他在自己的散文作品《儿时书》中所提到,他小时候就曾阅读过甚至背诵过类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样的儒家经典著作。张恨水小说中蕴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仁爱关照下的生活理想和传统男权色彩浓郁的女性观念等,都是张恨水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思考。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张恨水的《剑胆琴心》《水浒新传》《现代青年》《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作品。也许就是这样入世进取的精神,张恨水独自跑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面对着混浊的社会人生,张恨水身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名士气。他借助传统的道家文化来匡正自己在现实中的努力,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性情,寻求内心的自由与平静,保持一种泰然自若的人生态度,不断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这样的表现可以从《春明外史》中杨杏园的身上看出。处乱世而自清,保持一种“真”的状态,保持一种心灵的平静和人格的独立,也即庄子所说的“性命之常情”。这样的心态后来在他于重庆时期创作《巴山夜雨》时再一次出现。小说人物李南泉追求“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系”的高尚情怀,崇尚自然人性的考量以及人格精神的自由独立,均体现出乱世中的名士精神。

30岁之前的张恨水可以说是在不断的生活打击中前行。17岁时充满着理想的张恨水,因父亲的突然病逝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家道中落,昔日的无忧生活一去不复返。他随母回老家潜山。四处找工作、寻营生,却处处碰壁,回到家乡被人奚落为无用的“呆子”“戏子”“大包衣”(指胎盘。乡下人生孩子,将胎盘扔掉,意指废物)。而后,他又经历了婚姻的不如意。这一切他都扛住了,还

是充满理想地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然而随之而来的两件事使他备受打击,深感人生无常。一是他报考大学的人生理想的破灭。经过艰苦的准备,考试前夕,张恨水竟然意外收到朋友郝耕仁的来信,告知他家中经济困难的情况:他的两个妹妹将被堂兄张东野接出去上学。拿着信,张恨水失声痛哭,他决定放弃报考北京大学的意愿,承担起长子和长兄的责任,将家人从老家接出来。他接下了《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主编的职务,决定为这个副刊写一部小说。这就是1924年4月16日在《夜光》上连载的《春明外史》。在这部小说中,张恨水的佛学思想得到展现。“世上一切东西,都把它当作假的,就看透了。”<sup>[9]</sup>人生奋斗的失意让张恨水对佛教教义有了体悟。人生有太多的不如意、太多的不确定,张恨水开始领悟到了佛家所谓的“万事皆空”和人生的悲剧性。二是他的两个女儿的病故。张恨水的孙子张纪有这样的描述:“写《金粉世家》将近结尾时,我的两个姑姑,大的叫慰儿,小的叫康儿,因传染上猩红热在二十天之内先后去世。在开始写《金粉世家》时,慰儿刚刚有爷爷的书案一般高,我爷爷写作时总是要贡上一盘水果的,一是为了赏心悦目,一是为了果香飘逸有助文思,慰儿常常踮着脚要案头的水果,我爷爷慈爱地摸着她的头像对大人说话:‘别打扰父亲,父亲在作《金粉世家》’。《金粉世家》完成了,历经五年三个月,慰儿才九岁,已经像个大姑娘一样的懂事,而她却因传染猩红热随着妹妹康儿而去。这对我爷爷是极大的打击,我奶奶更是痛不欲生。”<sup>[10]</sup>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序言中说到“今吾儿死”,就是说的这件事。这件事对张恨水打击很大,使得他向佛之心更为强烈。“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富贵何为?名利何为?作和尚之念,又滋深也。”在创作《金粉世家》期间,他创作了《啼笑因缘》。从《春明外史》开始,经过《金粉世家》,再到《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佛学思想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期。

儒道的面孔,佛家的心,构成了张恨水小说不同的文化侧面,它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即使对于佛家的思想,张恨水也随着时代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抗战时期的张恨水展现出佛家思想的另一个面容:金刚怒目。1949年以后的张恨水又在佛家思想的避世观念中寻求心理平衡。这些都是另一个论题。

### 三、破“情执”:“情”何以“言”之佛学根由

以儒家入世,以道家出世,以佛家解脱。佛教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一部分。进入现代中国之后,虽然西方文化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冲击,但是佛教思想对知识分子依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道理很简单,世俗化的佛教思想太强大了,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中国文人谁也摆脱不了。所以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sup>[11]</sup>张恨水并不是佛教徒,却在佛学思想的氛围中成长,在事业和家庭发生变故的时候,以佛教思想作为解脱的渠道,是他的自然选择。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价值意义考量,当张恨水将佛学思想化作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构建,事实上,他也就为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创造了经典。

张恨水说过,自己是鸳鸯蝴蝶派的“胚子”,“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影响”。<sup>[12]</sup>确实,张恨水的创作起步于苏州蒙藏垦殖学校,最早的小说是周瘦鹃、包天笑等人作品的仿作。稍一比较就会发现,张恨水早期的作品是周瘦鹃的“言情”和包天笑的“社会”的杂糅体,例如他的《春明外史》。从这个角度上说,张恨水是将南方的“鸳鸯蝴蝶派”体移植到北方,从而提升了北方通俗文学创作的水平,让“鸳鸯蝴蝶派”文学从一个区域性的文学现象演变成全国性的文学现象。

然而,张恨水的小说又不同于周瘦鹃、包天笑等人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从文体上说,他对民初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进行了革命性地改造。他建立了主要人物贯穿小说始终的叙事模式。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模仿着《儒林外史》,“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sup>[13]</sup>然而,作家们又缺少吴敬梓的才华,这些形同短制的长篇小说,达不到“集诸碎锦”<sup>[14]</sup>的效果。这些小说故事结构显得散乱。张恨水在《春明外史》中将杨杏园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故事都围绕着杨杏园展开,小说结构就显得整齐。另一方面,张恨水建立了“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的叙事模式。张恨水说,他建立这样的叙事模式就是要“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原故”。<sup>[15]</sup>确实如此,自张恨水始,言情小说可称作为“社会言情小说”。更主要的是小说叙事经纬分明,却又水乳交融,故事线索清楚,情节跌宕起伏。再加之,他在小说中加上了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例如《春明外史》中写北京的秋天,《金粉世家》中写金燕西看见冷清秋的心理,均是上乘的笔法。张恨水说:“这是得自西洋小说。”<sup>[16]</sup>正因为有这样的变革,张恨水小说文体美学上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体。所以我们称张恨水是中国章回小说革新的大师,他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创作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文体只是“故事”构成的诸多侧面,“话语”才是意义的生成。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经典性主要生成在“话语”中。我们以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玉梨魂》与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相比较就能看出。言情小说都要写情之所困、情之所爱、情之所惨和情之所叹。在这个问题上,张恨水与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区别在于对情与命运的关系的思考上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念的不同。

《玉梨魂》写的是“因情造孽”和“死亡解脱”。白梨影之所以立意而死,是她认为:“我以爱梦霞者,误梦霞,以爱筠倩者,误筠倩矣。我一妇人而误二人,因情造孽,不亦太深耶!我生而梦霞之情终不变,筠倩将沦于悲境;我死而梦霞之情亦死,或终能与筠倩和好。我深误筠倩,生亦无以对筠倩,固不如死也。我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节,成就他人之好事,则又大可死也。”<sup>[17]</sup>因情,一个寡妇爱上了一个男人,却又误了自己小姑子的幸福,此为造孽;死去,既可以造就何梦霞与筠倩之好,也是自己名节之保全,此为解脱。一切冤孽皆为情缘。民初的这些哭得泪涕交加的情,在张恨水看来,十分可笑。他认为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情,一

切情皆为人生之“障”，只是人生劫难中的一个幻影，所谓“身弱劫难清孽债，途穷方始悟枯禅。乾坤终有同体日，天海原无不了缘。话柄从今收拾尽，江湖隐去债谁怜”。《春明外史》最后的结语诗，告诉世人人世间没有什么“不了缘”。

《玉梨魂》将男女坠入情网看成是一种“情误”。何梦霞遇见了白梨影，从此坠落情网。“自此而梦霞乃愈不能忘情于梨娘矣。梨娘欲力祛情魔，梦霞不免为情所误，梨娘独能免乎！”<sup>[18]</sup>张恨水将男女之情看得并不如此重。在他看来男女相见，继而相爱，就是一个缘分而已，“各有因缘莫羡人”，“无论什么事，都是佛家一个‘缘’字。有了缘，凡事不必强求，自然会办好。若是缘法尽了，一点也强求不得的。”男女相爱只不过人生道路上的一次相遇，有缘人而已，将情看成一种“误”，一种“孽”，大可不必。杨杏园不能与梨云、李冬青成婚，没有缘分而已。金燕西与冷清秋分手，是缘分尽了。樊家树与何丽娜在此相见，因为他们是有缘之人。有缘无缘本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

《玉梨魂》既怨情、恨情，又将情看作一种生命动力。有情万物生机勃勃，无情万物凋零枯萎。何梦霞与白梨影热恋之时，崔家小园一片盎然生气，梨花盛开得那么灿烂。何梦霞和白梨影都死了，崔府中“百草皆死，门内外一片荒芜，不堪入目，境地至为幽寂，何梦霞亲手构筑的埋香冢不复存在，庭前的梨树、辛夷早已枯干，兀然直立，枝叶皆化为乌有”。<sup>[19]</sup>痴情此日浑难忏，恐一枕梨云梦易残。张恨水并未将残情和情尽看得那么绝望与痛苦——或许还是人生的另一次新生呢？最有典型意义的当数《金粉世家》，一场大火烧出了冷清秋新的人生，一场失败的婚姻让她悟到了人生的另一种解释：“莫当真，浪花飞絮总无因”，“世事就是这样，一场戏紧跟着是一场戏来，哪里一口气看得完呢？”<sup>[20]</sup>

为什么《玉梨魂》与张恨水的小说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呢？其根本原因是《玉梨魂》将情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情的悲剧必然是来自于理的打压，演绎成一场情理之争。故事的指向是文化的质疑，是对不合理的社会规范的批判。为什么情就那么可怕呢？为什么寡妇就不能再嫁呢？为什么要发乎情止乎礼呢？为什么人就不能活得自由而快乐呢？由情执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这也就是《玉梨魂》乃至鸳鸯蝴蝶派小说引发的社会效应和社会价值。

张恨水是将情看成佛学中人生的一个幻像，情就是空，情的悲剧是必然的，也许还是一件好事，因为从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张恨水写情实际上是写命运，他的指向是人生命运本来无定，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劫难，从言情到悲情就是一次劫难而已。为什么在你我之间会出现情爱，那是命中注定；为什么又要分手呢，那是情爱的虚幻的破灭；为什么悲情之后总有新生呢，那是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由命运层面上升到宗教层面，这就是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的社会效应和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孰高孰低，我们很难判断。但是，如果将文学的经典看成是一种永久的存在，其价值存在的长短还是可以分辨的。在安德森的著名论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对宗教与民族关系的表述十



分精彩,我们将其作为本文的结尾:

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天堂解体了:所以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的呢?救赎是荒诞不经的;那又为什么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不可呢?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假设如果民族国家确如公众所认的,是“新的”而且是“历史的”,则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是民族主义的魔法,将偶然化成命运。我们或许可以随着德勃艾(Debray)的话说:“是的,我生而为法国人是相当偶然的;然而,毕竟法兰西是永恒的”。<sup>[21]</sup>

同样,该论述可以用以分析文学文本的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社会价值具有时代的价值,而时代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偶然”,而宗教“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它将“偶然”化成命运,化成意义,具有永恒的价值。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为什么能被称作为经典,其奥妙就在于此。

### 注释:

[1]老舍:《一点点认识》,重庆《新民晚报》1944年5月16日。

[2]张恨水:《小说考微之二七》,《张恨水散文》卷三,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

[3][12][15][16]张恨水:《创作自述》,《张恨水散文》卷三,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507、484、485、485页。

[4]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5]张恨水:《啼笑因缘》,太原:北岳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6][20]张恨水:《金粉世家》,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79、898页。

[7]张恨水:《明珠》,《张恨水散文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5—16页。

[8]张恨水:《作者原序》,《金粉世家》,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页。

[9]张恨水:《春明外史》,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17页。

[10]张纪:《我所知道的张恨水》,北京:金城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65页。

[13][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1、221页。

[17][18][19]徐枕亚:《玉梨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2、28、185页。

[20]张恨水:《金粉世家》,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98页。

[21][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